

Why I Write 我為何寫作

George Orwell
喬治·歐威爾著



五南文庫 015

我為何寫作

Why I Write

喬治·歐威爾 (George Orwell) ◎著

張弘瑜 ◎譯

五南文庫 015

我為何寫作 Why I Write

作者 喬治·歐威爾 (George Orwell)

譯者 張弘瑜

發行人 楊榮川

出版總監 孟樊

總編輯 龐君豪

企劃主編 歐陽瑩

責任編輯 歐陽瑩

封面設計 王正洪

排版 嚴致華

出版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106 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 339 號 4F

電話 (02) 2705-5066

傳真 (02) 2709-4875

劃撥帳號 01068953

戶名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網址 <http://www.wunan.com.tw/>

電子郵件 wunan@wunan.com.tw

法律顧問 元貞聯合法律事務所 張澤平律師

出版日期 2009 年 4 月初版一刷

定價 新台幣 220 元

有著作權 翻印必究（缺頁或破損請寄回更換）

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09, Wu-Nan Book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我為何寫作 / 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著

; 張弘瑜譯。-- 初版。-- 臺北市：五南。

2009.04

面：公分。--(五南文庫：15)

譯自：Why I write

ISBN 978-957-11-5525-8(平裝)

1. 歐威爾(Orwell, George, 1903-1950) 2.

寫作法

811.1

98000164

寫於五南文庫發刊之際——

不信春風喚不回……

在各項資訊隨手可得的今日，回首過往書香繚繞情景，已不復見！網路資訊普及、媒體傳播入微，不意味人們的智慧能倍速增長，曾幾何時「知識」這堂課，也如速食一般，無法細細品味，只得囫圇嚥下！慣性的瀏覽讓知識無法恆久，資訊的光速致使大眾正在減少甚或停止閱讀。由古至今，聚精會神之於「閱」、頷首朗頌之於「讀」，此刻，正面臨新舊世代的考驗。

身為一個投入文化暨學術多年的出版老兵，對此與其說憂心，毋寧說更感慚愧。自身的成長，得益於前輩們戮力出版的各類知識典籍。而今，卻無法讓社會大眾再次感受到知識的力量、閱讀的喜悅、解惑的滿足，這是以傳播知識、涵養文化為天職的吾人不能不反躬自省之責。值此之故，特別籌畫發行「五南文庫」，以盡「身之綿薄」。

文庫，傳自西方，多少帶著點啟迪社會大眾的味道，這是歷史發展使然。德國雷克拉姆出版社的「世界文庫」、英國企鵝出版社的「企鵝文庫」、法國伽利瑪出版社的「七星文庫」、日本岩波書店的「岩波文庫」及講談社的「講談社文庫」，為箇中翹楚，全

球聞名。華人世界裡商務印書館的「人人文庫」、志文出版社的「新潮文庫」，也都風行一時，滋養了好幾世代的讀書人和知識份子。此刻，「五南文庫」的出版，不再僅止於啟蒙，而是要在眾聲喧嘩、浮躁不定的當下，闢出一方閱讀的淨（靜）土，讓社會大眾能體驗到可藉由閱讀沉澱思緒、安定心靈，進而掌握方向、海闊天空。

五南出版公司一直致力於推廣專業學術知識，「五南文庫」則從立足學術，進而面向大眾，以價廉但優質、厚實卻易攜帶的小開本型式，取代知識的「沉重與昂貴」，亦即將知識的巨大形象裝進讀者的隨身口袋，既甜美可口又和善親切。除了古今中外歷久彌新的名著經典，更網羅當代名家學者的心血力作，於傳統中展現新意，連結過去與現在。

人生是一種從無到有，從學習到傳承的不間斷過程。出版也同樣隨著人的成長而發生、思索、變化與持續，建構著一個從過去到未來的想像藍圖，從閱讀到理解、從學習到體會、從經驗到傳承，從實踐到想像。吾人以出版為職責、為承諾，正是希望能建構這樣的知識寶庫，希冀讓閱讀成為大眾的一種習慣，喚回醇美而雋永的閱讀春風。

發行人

林青川

二〇〇八年六月

歐威爾——是歐洲良心，也是受苦英雄

南方朔

今年六月八日是喬治·歐威爾最重要的作品《一九八四》出版六十週年紀念。一九四九年的這一天該書上市，英國印二萬六千五百本，美國印二萬本，但旋即售罄加印，在美國由於成為「讀書俱樂部選書」，立即印了五十四萬本。

這本書在真的一九八四年到來時，到達他的最高量，該年的企鵝平裝本售出了七十五萬冊。這本書縱使到了今天仍然因為全球各國學校列為教材而市場不衰。據估計，《一九八四》以及其他第二重要——於一九四五年所出的《動物農莊》，加起來已有超過六十種譯本，賣出四千萬冊以上，在廿世紀的作家

裡，以他為最高紀錄。

《一九八四》乃是一部極具深刻底蘊的作品，可以連結到歐威爾的生平。根據後來出土的書信，朋友訪談等資料，今天人們已知道，書裡的黨幹部歐布里安（O'Brian）有著他唸寄宿學校時校長的影子；主角溫斯頓（Winston）一方面有自己懦弱壓抑的早年性格，也有他收養的兒子——後來命名理查·布萊爾（Richard Horatio Blair）的個性；至於女主角茱利亞（Julia）則是他和前任病榻前結婚的第一任妻子索妮亞·布洛奈爾（Sonia Brownell）的縮影；至於書中的刑求等場景，則一方面得自英國另一著名作家柯斯塔勒（Arthur Koestler, 1905-1983）——他曾在多個國家遭到入獄迫害，甚至還被西班牙獨裁政權判過死刑，死裡逃生，歐威爾從他那裡知道了各種刑求之事，而另方面也和歐威爾以前自己住院的痛苦療程經驗有關。另外書中最後的那部份，則從杜斯朵耶夫斯基的《卡拉馬佐夫兄弟》裡描寫的大陪審團得到啟發。歐威爾之所以傑出。乃是能把所有這些所看所聽所感的元素，整合到了一個集科幻、寫實、嘲諷於大成的作品中。

一九九九年，乃是《一九八四》出版五十週年紀念，美國芝加哥大學特地為此書舉行了一次重要的論文發表及討論的學術會議。該次會議的論文經整理後於二〇〇五年出版。這次會議的主旨，是討論這本已過了半世紀，而且是冷戰初期的作品。現在的人還需要去讀嗎？這部著作是否還有未來的意義？綜合該次學術會議的論文要點，大致可以得到下述重要結論：

(一)《一九八四》乃是一部以誇張而「反事實」的方式對世界做了一個黑色的寓言。儘管它的故事在字眼中有簡單以及標籤化的缺陷。但因它的「反事實」敘述，對讀者而言就比較沒有罷礙的容易接受，並會因此而願意去做更深入的思考。設若這部作品以更寫實的方式來表達，甚或在地方及人物上給人對號入座的聯想，那麼它就會因為多了現實的好惡繆轢，而影響到附帶思考的深度。在這樣的意義上，它那種表現的方式乃是成功的關鍵。

(二)這部作品所描寫的那種想像世界，在經過了半個多世紀後，由於監控技術的發達，語言符號的操作更加成熟，以及訊息的生產更加片面化與被扭曲，其實是以一種更自動的機制在形成中。以前的思想強制可能需要諸如刑

求、威脅、恐怖等作為手段。而現在及將來則可能像電影《桃色風雲搖擺狗》那樣，透過編製真實或虛假的事件而營造出氣氛，以及該氣氛下名為自由但實為不自由的思考及意識；此外，則是戰後迄今，由於公關這個領域日益擴張，人們的說話已由《一九八四》裡的「雙重言說」（Doublespeak），演變為一種可能更嚴重的「市場言說」（Marketspeak）——它的意思是，人們所認知與言說的行為，在概念、語詞以及指涉涵意上原本有著固定的關係，但「市場言說」則是把這種關係打亂，於是「是」變成「非」，「非」也會變成「是」。語言的混亂會造成是非的混亂。語詞的「脫道德化」，已成了近代極為嚴重的課題，如「侵略」被說成是「預防攻擊」，它似乎就不再是「侵略」，也就抹除了道德上的不安。所有的這些新趨勢，都已成了現在及未來的重大挑戰及難題，「九一一」之後以及接下來的反恐戰爭，即印證了語言及思想操弄的嚴重。而網際網路、無所不在的監視攝影，雖然以治安反恐為名取得了正當性，但設若情況改變，它的確為侵犯自由和隱私做好了部署。

(三) 從啟蒙時代以來，人類之所以會一點一滴的進步，乃是人類為進步

創造了許多概念上的條件，如「客觀性」、「自由」、「個人選擇」。人們以這些概念來評斷是非善惡及進步倒退，但到了近代，隨著「國家」角色的增強，國家間與國家內的關係開始緊張。訴諸「共同命運」的「團結」、「平等」等概念也告形成，於是所謂「團結—自由」「集團—個人」這個對立的難題就成為了政治及社會哲學上的長期爭論之一，連帶的如到底是否有真正的「客觀性」及「個人選擇」，也開始受到挑戰。歐威爾在這些問題上其實是很悲觀的。在書的最後，「個人選擇」與「自由」被打敗了。在他活著時，這樣的結果被說成是它反映了共產主義的可怕，更強化了當時的反共反極權信念，而到了現在，共產主義——特別是史達林主義早已消逝，人們也就必然開始去看歐威爾的那種懷疑主義與悲觀主義思想了。

(四) 人們到今天，已知道歐威爾的一生從在緬甸當警察起，就情人不斷，有緬甸娼妓、女理髮師、法國娼妓、女贊助人和女作家等，性的問題已成了歐威爾問題裡一個重要、神秘、而可以心理分析的重大破洞。而在《一九八四》裡，性即佔了重要的一部分。小說裡的渥斯頓，已婚分居而宿

娼，他對母親有著罪惡感式的思念，第一次婚姻在性上的不能滿足使他成為「恨女人主義」者，並因而做著禁忌而又畏懼的宿娼。而女主角茱利亞對他所做的性的再啟蒙，終於使他一度相信政治的壓抑與性的壓抑乃是一組配對，專制主義乃是透過性的壓抑將性慾導向到政治的狂熱與壓抑上，小說裡那個偽裝和思想警察賣給他的那個裡面鑲著紅色珊瑚的玻璃畫鏡，遂成了性艾圓滿的象徵——性愛乃是性壓抑的重要防線，而這也是解放政治壓抑的根本。而到了最後，終於證明這只是一種空想，玻璃畫鏡破了，他們的性愛不但沒有被提高到反政治迫害上，反而是絕望的在性的想像裡，兩種自由皆告淪喪。歐威爾自己生命中的性與小說裡的性，因而成了歐威爾研究裡的重要解謎團，只需要從生平去找解答。

因此，總觀上述四個主要課題，歐威爾集大成之作的《一九八四》，對這個世界當然仍舊有重論的價值。這本著作當年被認為是戰後反史達林主義的第一本寓言作品，其中有關思想監控洗腦、刑求迫害、警察國家這些情節，都沒有因為時代改變而消失，他的威脅反而以另一種柔性的方式出現，這的確是

歐威爾過人之處，近代描寫極權國家的許多專有名詞，如「歐威爾式的國家」（Orwellian）、「老大哥」（Bigbrother）、「雙重言說」（Doublespeak）等均皆出自他的手筆，單單這些，他就堪稱具有時代性的貢獻。而除了這些之外，隨著時代的過去，他的全集於一九九八年被戴維森（Peter Davison）整理出版，多達二十卷，八千五百頁；加上有關他的傳記迄至目前至少已超過了半打；以及對他研究的加深，許多更新的課題已告出現，例如他的作品涉及的許多思想問題，例如他為什麼會以寓言的方式寫政治小說？在寫這種型態的小說前，他早有多本寫實性的政治小說，為何那些皆告失敗？他的小說為什麼到後來只歌頌「平民」？他這個曾經自稱「左派」的人物，他所謂的「左」究竟是何意義？他對性的問題充滿了謎團，不但性關係複雜，性觀念也同樣複雜無比，原因為何？而最關鍵的是，由他的作品，顯示出他對整個人類的未來其實是悲觀無比。美國芝加哥大學法哲學及道德哲學教授、當代重要學者瑪莎·魯斯鮑姆（Martha C. Nussbaum）明白指出，「憐憫」（pathy）這個概念從古希臘悲劇和亞里斯多德道德哲學起，就是人類價值最後的核心，「憐憫」指的是人對別

人的感受能有「共感」，它超越了特定對象，而成為一種普遍的感情，而歐威爾的作品裡最深層的乃是「憐憫的死亡」，魯斯鮑姆教授如此說道：「在《一九八四》的最後，渥斯頓逃避到了徹底自私、徹底反悲劇的自戀主義中，這不是一種突然的轉折，而是深指在他人格傾向裡的一種結果，如果他有好的家庭及社會條件支持，當可免於這樣的結果，像他這樣脆弱的蘆葦又怎麼可能寄予人性的期望。而歐威爾在寫的時候有意識到這一點嗎？我極懷疑。因為在渥斯頓身上，有太多歐威爾自己的縮影。」

魯斯鮑姆教授從歐威爾傳記以及人格發展等更新的角度解釋歐威爾，她認為歐威爾從中學寄宿起，就疏離自戀，追求個人突出，他一生極為辛苦與不安全，這些因素造就了他作家的聲名，但也丟出了許多更深的問題。而他的見解其實仍是相當學術但溫和的。當代主要思想家薩伊德（Edward W. Said）就表現得直接多了：

「歐威爾是個很有天份的觀察者，但他同時也是個與自己的觀察對象保持疏離的人。……他晚期得了多疑症，對周遭的人產生一種恨（厭）人類

的情緒。……他的作品包含著一種極端不討喜的組合，一方面是對不義的強烈仇恨，一方面則是對人的憎惡。……他有一種孤立心態，恨人類，在《一九八四》書中每一個角色都是主角潛在的敵人。他的遠景是荒涼和狹窄的。」

因此，對歐威爾，人們其實有著非常不同的雙重評價。從現實政治及社會的角度看，他確實觀察敏銳，他自我修正也極快，特別是對政客們的濫用語言，更具有那種後來語意學和語用學也不得不佩服的先驅之見。但換了一個更人性、特別是更心理分析及更哲學的角度，人們則發現歐威爾其實反而成了一個必被探討的對象。他是個活得辛苦、相當破碎而掙扎的人物。他自幼即多遭欺凌孤立、多病。父親又極平庸，是個離家在外的小殖民官。他有著非常獨特的反權威心態。而這種心態又是那種自居「圈外人」的冷淡嘲諷。他討厭女人，又迷戀女人，感情與性甚為顛倒。這也顯示出，要更透徹理解他，除了偶像地位外，還必須從他的生平傳記上著手。

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是筆名，他的本名是艾立克·布萊爾

(Eric Arthur Blair)，他的家系遠祖來自蘇格蘭。在曾曾祖父那一輩頗顯赫，在牙買加販奴起家，進到上流社會，但後來沒落，他的父親只是印度殖民政權鴉片部的一個小官，而他的母系家族也同樣是個顯赫的殖民家族，他的外曾祖父在緬甸的家裡有多達三十個緬甸僕人。他的父親大母親十八歲，他們一八九〇年在印度結婚，一八九〇年生長女瑪喬妮 (Marjorie)，而他則於一九〇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出生於印度孟加拉的摩蒂哈里 (Mothari)，翌年他母親帶者姊弟兩人先返回英國，他的父親則留在印度工作，間歇的回到英國，一九〇八年他的妹妹愛雅兒 (Avie) 出生，直到一九一二年他父親退休才返回英國與家人團聚。他父親是個平庸的人，當殖民小官一年才薪水六百五十英鎊，退休後年俸只有四百三十八英鎊。由於父母分離而且老夫少妻，據稱在分離時他母親另有情人，而他父親則在印度經常嫖妓。他退休返英後，在一個鄉村俱樂部當秘書。由於從小缺乏父愛，母親又熱衷於他們的經濟能力不足以負荷的上流活動，他自小缺乏父愛與母愛，十八個月大即罹患肺病，終身未癒。加以小時候唸書，艾立克這個名字常被取笑，於是 he 對父親取的名字極為厭惡，後來才

替自己取了有蘇格蘭特色的喬治·歐威爾。由此可知他從小的不快樂與不安全了。

歐威爾最早進修女辦的幼兒所，修女對他不是很好。而後進初中，再後進了上流子弟唸的伊頓公學。他的求學生活後來有許多解釋，但綜合各種資料，他並不快樂，孤僻而愛讀書，很早就想靠寫作來突出自己，而在伊頓公學時，他的成績並不是很優秀。於是一九二二至二七年間加入印度殖民政府駐緬甸警察局。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才辭職返英。他的緬甸探險，在一九三四年半自傳小說《緬甸時光》(*Burmese Days*)，以及伊頓公學時曾去緬甸探訪過他的同學口述裡，即可得到一個不好的印象。他那種為了反帝國殖民主義，「你必需成為它的一部份」的奇特反殖民主義觀點，即在當時形成。

歐威爾會到緬甸當警察有許多可能的原因：家庭的殖民傳統；來自父親以及想要超過父親的成就感；伊頓公學時的成績平凡使他難以出人頭地，而想去異地開創新天地。但他到了緬甸，所見所聞都是那種頹廢沒落但卻繼續宰制的官僚、特權、腐化，形同劫掠的劣根性；但他對緬甸人同情支持嗎？卻也不。

小說主角佛洛瑞（John Flory）那種既討厭殖民主義，又厭惡緬甸人的虛無主義，且在緬甸娼妓身上找寄託，即有歐威爾自己的影子。有個他昔日的同學去緬甸探望他，他也夸夸而談緬甸的娼妓如何如何，是「世上最美的女人」云云。

對此，像當代主要文化思想家伊格頓（Terry Eagleton）即有過尖銳批評。

但這種奇怪的反殖民主義並非只有歐威爾而已，近代西方，縱使到了現在，仍然還有一種文化人，表面上反殖民主義，但他們並非反對殖民主義本身，而是反對殖民主義官吏而已。至於被殖民地則成了他們的一種鄉愁，而這種鄉愁又特別寄託在那些「垂手可得」（available）的被殖民地女子身上，他們的反殖民主義不是反「本質」，而是反「過程」——歐威爾自己就經過對「過程」的不滿。而這樣的思想，其實也和他自稱的「左派」及「社會主義」有類似之處。早年在念伊頓公學時，整個歐洲，當然包括英國在內，「社會主義」都是一種當令的潮流，但大家說的「社會主義」究竟是什麼內容，卻言人人殊，分歧的極為嚴重。歐威爾由於從小就被各種身份權威較高者欺侮歧視，因而他號